

陶渊明独领风骚的隐逸观

魏春园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广东 东莞 523960

【摘要】：不同于同时代的以物质生活为基础或是无法摆脱名利之欲的隐士，陶渊明对于隐逸生活有着独特的见解。陶渊明的隐逸观具有“固穷守节”，正视生死，提倡归返自然，将隐逸和田园生活结合起来的独特性。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独特性

DOI:10.12417/2705-1358.26.13.017

陶渊明对于隐逸的独特态度，离不开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环境以及家庭背景和自身经历所带来的影响。与同时代的隐逸之风相比，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更趋向于真正的隐士，使人更具有豁达的体验，在魏晋隐逸思想中独树一帜。

1 陶渊明隐逸的背景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权频繁更替的时代加之天灾人祸，社会生活和政治环境急剧变化。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的正统地位渐渐衰微，文人思想逐渐向老庄思想倾斜并发展迅猛，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为摆脱社会不公和生活苦难，当时的文人隐逸成风，陶渊明也不例外，他隐逸的主要原因大致可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1.1 政治背景

东汉的恒、灵二朝，皇帝弱小昏乱，公开售卖官爵，朝堂宦官当道并同豪强土匪勾结，残害百姓，党锢之祸更是令有志之士伤了神、寒了心。五胡乱华、八王之乱、十六国纷争下，统治者拉帮结派、豪强贵族敛财无度，有志者常祸不单行、难以得到重用。

到了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仍然是一个社会矛盾诸多，百姓苦不堪言的时代。就如和陶渊明同一时代的世家大族刁逵兄弟，史称“兄弟子侄，并不苟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晋书·范宁传》：“今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把百姓当做赚钱和奴隶使唤，使得东晋也陷入了内忧外患境地。人们想要为国效力没有机会，想要过好平静的小日子也没有机会，时不时还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1.2 文化思潮

杀戮不止，政治混乱，报国无门，前代的学术思想已经不能维持百姓尤其是读书人的信仰了，此外文人墨客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纷纷觉醒，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谈玄说理，强调回到原始的无争无欲的自然状态等道家思想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老子强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

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刘大杰对其作出解释“无为政治的真义，是要君主少私寡欲，不必故事矫饰，卖弄智巧，作出种种损物伤性劳民伤财的事体。使百官各尽其能，万民各安其业，就可以到达国治民安的地步了”^[4]，这也直接讽刺了魏晋的奢靡之风。魏晋时期豪强士族、达官贵人将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肆挥霍，变换美酒、美食、美色出场的方式，把斗富成为竞相追逐的新风尚，让百姓苦不堪言。

在《逍遥游》提出：“夫物未尝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则羨欲之累可以绝矣。夫悲生于累，累绝于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齐物论》中也说“死生之变，犹春夏秋冬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可见，与其贪图势力、偷取富贵、羡慕他人，不如顺情适性，不在乎悲哀苦乐，不被羡慕所拖累，也是魏晋不少文人百姓所倾向的逍遥自适，不被时代所累的人生观。

1.3 自身经历

陶潜的祖上陶侃虽是一个大家族，但是在门阀士族兴盛的东晋，那些世家大族也是瞧不起兵家出生的陶侃家族，更何况到了陶潜父亲一代就已经明显出现家道中落的迹象了。因此，家族的荣誉并没有给陶潜在官场上带来很大的便利，至少不能平步青云到他才能应该达到的位置。

陶潜在壮年时也想在仕途上有所前进，有所收获，但是现实的残酷和贵族的不公使得他在归隐和做官之间徘徊不定。从饱读诗书、怀揣梦想到志意多耻、终当空无。《杂诗》中曾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政治渴望，拯世济民的用世思想，胸怀“大济于苍生”的热情抱负，充满了理想与志气，有一股壮志凌云的侠客豪气。《拟古九首》“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他渴望建功立业。曾经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奈何君主的昏庸当道。《饮酒》其十九：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其它诗中的句子中“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与“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等。陶渊明在看透当局者的本性后，在诗中明确指出，做官是有违背他本性的，仕途的丑恶是他难以接受的，他十分想要远离官场。

在他四十一岁时，同父异母的程氏妹的死成为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归去来兮辞》中的《序》中写道“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陶潜这次弃官后没有不再出仕，彻底走入归隐园田之路。

2 同时代的隐逸之风

魏晋的政治黑暗，社会环境混乱，百姓有苦又不能言，促使清谈、玄学和逍遥观等思想的发展，加上人性的觉醒，使得有志之士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抱负是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因此退步于隐逸生活，但隐士们依旧无法真正的超越现实生活，真正地把自己置身事外。

2.1 物质基础上的避世欢娱

在隐逸的人群中，不乏文人志士结伴出游，在自然山水中或是吟诗作赋，或是清谈闲聊，抒发各自的志趣。王肃之《兰亭诗·五言》中提到“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吟咏曲水滨，流波转素鳞。”游玩之处以雅为盛，以此便利这些文人志士摆脱政治混乱、朝廷争斗的环境，让自己流连忘返于美景之中。

这种隐逸活动是基于一定物质基础上的，无需为自己的一日三餐着想，可以去雅致的地方抒发心情。但是这种隐逸往往是短暂的，因为他们没有从思想根源上去突破自己达到归隐，而是依靠环境的改变来驱散内心的不满，弥补心灵的空缺。当他们回到现实生活中去，面对现实的种种欲望，便也亦步亦趋，患得患失。陶渊明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中说道：“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愿言诲诸子，从我颖水滨。”表达对这种隐逸的不满和不屑。

2.2 标榜自然，无法摆脱名利之欲

隐逸之风一方面是有利于文人抒发自己的情绪，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对当权者来说，是一大批人才的流逝，对其统治地位造成威胁。晋葛洪《抱朴子·贵贤》中提到“世有隐逸之民，而无独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无忧，君不可以无臣而致治。”因而当权者每每需要请隐居者出仕，来彰显自己治国理政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有不少文人“标榜自然”，重形式轻内容，重名义不重实际。他们借着隐逸之风，以退为进，先隐居后利用别人的邀请出仕做官，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声望或者政治地位。

过分看重名声，违背自然属性。《晋书》记载：“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淝水之战是魏晋时期的著名战争，不仅是少胜多，更是扭转国运的关键战争。当谢安得知自己侄子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时，脸上却了无喜色。这种过分的追求名声、名节，压抑自己的本性，无法抒怀自己的自然之性。

2.3 看重性命，思想具有妥协性

采取敷衍的形式当官，麻醉自己，隐于朝。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治理，使得不少文人为了自保，不得不去当官。这种所谓的隐于朝，在思想上具有软弱性，往往表现为思想和行为上冲突不止，最终也未能真正的使心灵得到解放，只能一味的麻醉自己，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

年轻时代的阮籍是踌躇满志，志气昂扬的英俊少年，奈何曹魏政权变化，朝堂明争暗斗残忍激烈，无辜受害者数不胜数，阮籍的思想也转变为消极避世。在曹氏恩泽下出生、长大，时过境迁，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阮籍选择了在中年为掇掇皇权的司马氏一族服务。有一次，有司对司马昭说，有个人把自己的母亲杀了。被在旁边的阮籍听到后，不禁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说道：“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这在当时是直接违背孝道的说法，在做的宾客对此十分诧异，司马昭也继续追问。阮籍为了脱险，辩解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为了保全性命，做了多少年自己不喜欢的官，说了多少次违心话，未能突破自我，做到真正的隐士，终究是害人害己。

3 陶渊明的隐逸思想

3.1 顺应自然，回归自然

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说：“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李剑锋曾说“陶渊明的自然之美，决非一种荡而不返的美，而是自然有节、善荡而能回的美。”^[6]对自然的认识，陶渊明认为天地山川自然界的总体面貌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们如同小草一样在来年春季又会容光焕发，但是最具灵智的人的躯体和灵魂，在人死亡后便也一同消失再现了。陶渊明重视老庄的贱物贵身和返璞归真的思想，认为功名富贵是有害身体和生命。他提出“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等，不主张过分的“贵身”。陶诗中也多次表达诗人自己回归愿望。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和《饮酒·其三》中写道“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面对现实的不公，儿子的不争气，生活的穷困，陶渊明“采

取了《庄子》自然无为的‘委运’顺从、坦然接受的态度。如果说‘委运’还倾向于无可奈何的消极适应，那么其中蕴含的顺任自然的内容则进一步发展为‘乘化’，即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顺应自然。”^[6]陶诗中有“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在这里“化”指的是宇宙、造化、自然，突出的是它们变换不息的特点。自然既然是变化不停的，那么作为自然所化生的人应要效法自然，“乘化以归尽”。

《形影神》三组诗指出，“‘形’断言自己的结局是‘奄去靡归期’，‘影’也知道终将与‘形’一起‘黯尔俱时灭’，‘神’更认为‘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1]“神”中明显认为个体的生命是于自然当中而产生的，不要执着于追求个体生命的无限发展，要返回自然，使个体与天地融为一体。郊中归隐、回归自然、抱朴含真，陶渊明对“自然”的热爱，对志向的坚守，使得他并没有被“口腹自役”所累，没有接受著作郎的征召，对于刺史送来的梁肉挥之而去，自然真性的活在旷远的境界里，在顺应自然、回归自然的道路上有所成效。

3.2 隐逸和田园结合

“时代风气的熏陶是外因，陶渊明自身性情的喜好是内因，而内因虽起决定性作用，但离不开外因的引导。”^[11]东汉末年，统治者残酷无情的处世态度一次又一次的将他们所推崇的儒家仁义观念推翻，也激起了人们心中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并且呈现出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统治者尚且可以不仁不义、滥杀无辜和骄奢淫逸，百姓心中的仁义又该如何坚守呢？因此，就如《庄子》里所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一旦认识到仁道并不是生命的目的和归宿，那么就会对个体自身的发展存亡格外关注。

在这种背景下，陶渊明对生死和岁月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岁暮和张常侍》中“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时间运转，转眼又是一年除夕，市朝中的景象凋零如此，人何尝不是避免不了岁月的流转。离去的壮年，迎

面的老年，在万物荣枯中感受着生于死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该是多么凄凉悲切，独自长悲。比起在魏晋时期那些有意回避生死的文人，陶渊明却是正视生死并将其转化为生活的积极动力。“对生命‘终当归空无’的负面命题生成了返本归真的正面价值，对生命‘幻化’‘空无’的否定性情感体验成了去追求生命本真性和本源充实性的内在驱动力，一种消极的生命感受终于在陶渊明身上获得了一种积极的意义。”^[5]

他主张让生命本真地存在，积极投身于田园生活中，在田园生活中近距离的、尽可能的回归到生命本来的面貌即由自然产生，那便回归到自然。《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将归隐与田园生活相结合，坚守自己的气节、志向，守护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被世俗所污染。

陶渊明知道自己的钱财不足，但是他正视自己食不饱的生活情况，在此基础上去深入探索隐逸道路，做到了不被身外之物所累。“人生修炼转移到针对自己人格的‘固穷守节上’，‘固穷守节上’要达到的终极关怀的目标是‘安贫乐道’”。“安贫乐道并不是以贫为乐，越穷困越好，而是超脱不得不然的穷困干扰，避免穷困破坏了与善道同在的愉悦心境。”^[5]《桃花源记》中所谓的世外桃源也是基础平常、普通的田园生活上。守住拙性，固穷守节，隐逸与田园的壁垒被打破，陶渊明也做到了真正的归隐。

4 结论

相比较于魏晋其他隐者来说，陶渊明的隐逸是最成功和最具意义的，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苏东坡青壮年时期不喜欢陶渊明诗歌，晚年尤其是在被贬谪海南岛的漫长岁月中，却日益酷爱陶诗。晚年的苏东坡，陶诗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食粮。”“苏东坡说陶诗‘外枯而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宋代黄庭坚也有类似的说法。”^[11]陶渊明直面生死，正视贫穷，不被外物所累，归返自然、回归田园，在自然和田园中守住自己的拙性和生命的本真，在魏晋隐者中独领风骚。

参考文献：

- [1] 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
- [2] 董淑梅《何为“大隐”——析阮籍、嵇康、陶渊明之隐逸》，《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 年第 9 期。
- [3] 高智《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铜仁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 期。
- [4]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0 版。
- [5] 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6] 李锦全《陶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7] 钱惠梅《陶渊明隐逸原因初探》，《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第 3 期。
- [8] 张建伟《陶渊明隐逸的独特性》，《九江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 [9] 朱秋萍《魏晋的隐逸文化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语文学刊》2007 年第 18 期。
- [10] 张泉《论陶渊明的隐逸及隐逸生活》，《理论学刊》2002 年第 3 期。
- [11] 钟书林《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